



徐水文史资料初稿

政协办公室编印

第5期

1986.

徐水文史资料初稿

(五) 后

目 录

儿童团长历难见闻.....徐水五金公司 高志元
.....(1)

我被抓当劳工的经历.....西留营 王文乐
.....(11)

荆塘铺碉堡概况.....荆塘铺 抗洪录
.....(17)

荆塘铺日伪大乡简况.....荆塘铺 抗洪录
.....(19)

儿童团长历难见闻

徐水五金公司 高志元

人生坎坷，命途多舛。抗日战争期间我当儿童团长时，经历过一段苦难岁月——被敌人抓捕押送日本充当劳工。

一、被捕前后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全面反攻，徐水支队经常智击徐水城关敌伪驻军，距徐水城东五华里的南梨园村——我的家乡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前沿阵地。徐水路东抗日军政人员为发展壮大抗日民主阵线，反击敌伪“清乡”活动，乃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沿用敌伪保甲组织，“旧瓶装新酒”，建立起村自为战的两面政权。那时，我叔高风美任南梨园村村长兼武委会主任，我任本村小学儿童团团团长。我们学生儿童经常站岗放哨，监视敌人，通风报信，或深入内地，转送信件，传递消息，或潜入县城闹市，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政策。

一九四四年农历八月初七日（公历九月二十三日）清晨，敌伪以近百名武装包围南梨园村，大肆搜捕抢掠。日伪走进我家，目标明确，径直抓捕捆绑我叔侄二人，指定是“八路的村干部，死了死了的有。”敌伪又从我衣兜中搜出前一日我到区公所开会带回的一部未发出的反愿意日法西斯同盟的传单。敌伪以此为据，对我拷打，讯问逼供，问我干什么，传单从那里来，送交那里去，等等情节。我决心忍痛咬定：我是种地老百姓，自幼贫苦没上学一字不识，传

单是从地里当烂纸炼的。敌伪弄不到口供，打得我天翻地转晕了过去，我仍一口咬定，不露实情。敌伪折腾到太阳西斜，在我村抢足粮食财物，扒了大车，将我叔侄捆绑扔在车上，连同粮食财物押送徐水县城。在大车上，我叔以坚毅敏锐目光注视我，我领会叔父暗视，要坚强勇敢，一定保密。我虽抿嘴点头，示意坚决斗争。

我叔侄被捕后，敌伪又派驻防徐水县城两名伪军于农历八月十三日（公历九月二十九日）到南梨园村催征粮款，被我武工队员将其武器缴械放回徐水。翌日，敌伪偷袭我村，抓捕农民三人压在徐水。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十月一日），敌伪又在北关短工市场抓捕我村上市打短工农民二人也关押在徐水。敌伪在不满十天内先后抓捕我村干部、农民共七人。

事件发生后，区里领导及众乡亲都惊心动魄，担心我们遭受酷刑而妄说，招引敌伪洗劫村庄。一方面由组织上狠抓敌工工作，设法震慑伪军队长及汉奸翻译，促其减免酷刑，不得逼供；一方面由乡亲按地亩“拨差”三次，借用徐水伪新民会会长高鹤年（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军二次解放徐水城被镇法，南梨园人）之手，贿赂敌伪，买通关节，尽力营救。

我叔侄二人被敌伪扔上大车押送到徐水城内城隍庙后身，这是日军木村队驻徐水的大本营，被抓入木村队大本营的中国人是有死无生，号称杀人的“阎王爷”。我们被分别关押在后店西厢牢房，牢内阴森潮湿，铺被草袋。每间牢房关押六、七人，昼夜有鬼子荷

枪实弹监守。白天，必须背靠凉墙并排静坐，不准说话、站立、走动；夜间，要在原位就地仰卧，不准翻身、睁眼、私语。解手要报告，经允准方能行动。稍有疏忽，棍子沾身，轻者肝痛，重则皮破血流。饭，是两、三天只吃一顿半饥半饱的玉米面窝窝；水，不准饮用，渴了只得“抗旱”。被提审者，日夜不断，都是立着走出去，拉着拖车，没见一个囫圇身。起初，我多次受审、挨打、讯问逼供，不久，变审讯拷打为酷刑恫吓，妄图诱供。我察觉敌人硬打软化，目的在从我这小孩口里掏口供。敌人得不到情报，只得将我关押在牢。事隔一年我才知道，这是区领导和乡亲营救的结果。

关于我叔侄二人被敌伪抓捕一事，经我敌工人员查实，是因敌特告密、带路。原来，南梨园村有个大烟鬼高琛，外号“高地麻”，老乡说他“任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一九四四年，高琛在徐水北关东胡同开设饭馆，表面送客迎宾与汉奸狗日的鬼混做生意，暗中却长耳绕舌刺探我军政情报，专门向敌伪告密，充当敌伪情报员。高琛为向敌伪献媚表功，便密报南梨园村抗日组织情况，充当敌伪向导包围村庄，为虎作伥，便利敌伪掠夺民财，抓捕乡亲和抗日人民。这年冬天，李子清同志遵照上级关于高琛罪恶事实的处理意见，带领武工队员乔装入市，在东胡同将高活捉，押解北梨园村北大坑中就地镇压，除掉殃民祸国之害。

提起“万人坑”，令人胆战心惊。—— 3 —— 同仇敌忾：一九四四年春，

二、“华北劳工协会”真相

一九四四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公历十月七日）黎明，敌伪将我们被关押的二十来人重新捆绑从城隍庙压送徐水火车站装入闷罐车。阴暗中见到我村六位乡谊，自觉有了伙伴，但不敢通话。在四壁无孔的车厢里运行了一整天，到伸手不见掌的深夜车才停转。下车后，我们被串绑一行，由敌伪压送进入在塘沽海难旷野地带建立起有铁丝网围绕的房院，这是日本军政界设置的中国劳工集中营，美其名为“华北劳工协会”。

“华北劳工协会”！多么扣人心弦、阅耳动听的美称啊！可我们一进这所大院，敌伪强令脱净衣服，赤身裸体，光脚走进木房。同时见到这里已被关押的数百名中国劳工，都赤身光脚披破棉毯遮体盖羞。敌伪如此凌辱中国劳工，借口是“防备逃跑”。劳工关押在阴暗潮湿、不透阳光四面通风的木房里，每顿饭只给一个填不饱肚肠且有霉烂气味的玉米面饼子和一碗苦咸的水。房外，鬼子带枪巡逻，岗哨不断；房内，汉奸持棍监管，严禁说话、站立、行走，地无铺草，只能光腚蹲坐。解手要报告，拉尿在便缸，尿屎臭味浓厚难闻，劳工经常得病，呕吐拉泄，偶一不慎，排在缸外，便遭毒打。劳工因饥饿、疾病和棍棒折磨，每天都有离开人间被扔进塘沽海难边“万人坑”内去的。

提起“万人坑”，令人胆战心惊，同仇敌忾：一九四四年春，

最先关押到“华北劳工协会”的中国劳工，因敌伪残酷折磨无法生存乃挺而走险，在敌伪武装监视下举行过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全员大暴动：劳工们乘漆黑夜晚，用棍棒打死敌伪看守，击碎照明电灯，打断铁丝网，群情激动，一涌而出，直奔西、北两面逃命。敌楼哨兵发现，开枪扫射；敌伪闻听枪响，仓促出击，持枪追捕抓杀，数百名劳工死于非命，很少死里逃生。敌伪把参加暴动而死难的劳工尸体，集中葬埋于塘沽海难边大坑内。以后，“华北劳工协会”死亡劳工，都葬于此，形成肉丘坟，命名“万人坑”。

“华北劳工协会”仅在农历八月下旬，即我们被转运停留的十天内共拘禁转运两、三批中国劳工，从臼齿方生的少年到年近古稀的老翁约三百余人。主要有：一是武清县党、政机关干部九十余名，是敌人在天津西北地区拉网扫荡时被包围抓捕的。副县长姓王，身材魁伟，颇有见识，与我叔默契，去日本国采煤砸折一条腿，日寇投降后回国又参加革命，曾于五十年代初，乘专车来南梨园村看望过一趟；二是行唐县伪警备队一个中队约六、七十人，队长姓黄，因在行唐县山区一碉堡驻防时，与我敌工密约，多次乘我武工队攻打该碉堡之机，一面冲天鸣枪，扬声反击；一面投掷子弹，送予武工队。日寇查觉后，将全部人员拘禁，充军劳工；三是敌伪用发工资雇佣手法从定兴、涑水两县诱骗的农民百十来人。自知已中敌计，难以脱逃，只得生死由命，经受折磨，待机行事。我们徐水二十来

人，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一九四四年农历九月初一（公历十月十七日）凌晨，乌云密布，细雨蒙蒙，我们三百余名劳工被敌伪撵出木房，整队站好，一个个赤条条的裸体，披破棉被，光脚立在泥泞地上，秋雨淋漓，北风萧飒，寒气袭人，冻得劳工唇紫牙打，浑身发抖。“华北劳工协会”一汉奸头目，身着雨衣，足登胶鞋，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欢送大家远渡重洋，到大日本国当劳工，这是为“增进中日友好”，途中要听“皇军”指挥，现在立即整队上船，谁敢逃跑，定遭枪杀。随后，我们赤脚光腚，以破棉毯掩身，由敌伪武装监护，踏着泥泞道路，在寒风冷雨中向东海海难走去。中午时刻，我们被装进一艘开往日本的货轮。鸣笛起锚，我们被迫告别同胞，离开祖国怀抱，送往异国他乡，心情沉痛，难以言状。

登上货轮，尽载日寇掠夺我中国煤炭，舱顶空间三、四尺，无法站立，只好铺煤躺卧，与祖国矿藏为伍。开始每人每天发给两个杂合面饼子充饥，喝海水解渴。过了几天，船上装的饼子发霉难闻，不能入口，劳工只有挨饿。海风吹起，货轮摇晃，劳工恶心、呕吐、晕倒，数日难愈。病号劳工，无医治疗，生命垂危，不待断气，即被日寇拖出船舱投入大海。途中，我见到七位中国劳工被葬身鱼腹。此情此景，熟可忍，熟不可忍！

三、“中华寮”内幕

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历十月三十一日），结束海上颠波苦难生活，身披棉毯在日本国门司（今北九州市一个区）下船，改乘火车被押运到福岡县大牟田市一个关押中国劳工的院落，日语称“中华寮”。“中华寮”建立在孤孤的小山顶上，东、西、北三面都是荆棘丛生的陡坡悬崖，只在南面有条曲曲弯弯羊肠小道可上下山顶出入。“中华寮”四面建有高大木板墙，墙上架有电网，门口建岗楼，鬼子昼夜轮流站岗守卫。劳工出入“中华寮”之难，难于上青天。

“中华寮”内关押中国劳工五百余人，我们被关押时，已有二百余人，大部是敌伪从涑水县一带用工资诱骗来的。我们五百多劳工，被迫给日本福岡县大牟田市三井三池炭矿采煤。三井三池矿在日本国九州岛中部偏西，距“中华寮”仅三华里，是日本商界经营的主要炭矿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劳工大量从戎投入侵略战争，日商便以工资诱骗华人充当劳工，日本军政界则抓捕华人充当劳工，从中攫利。三井三池矿井工人是由中日劳工各占半数混合编组，实行八小时，三班倒、计件制。中国劳工上下班三华里路程的监护工作由“中华寮”日本人负责，矿井口交接任务，劳工一下井，则由日本带班采煤人员负责监视。鬼子对待劳工尤如猪彘，每餐只给一个杂合面饼子，饿得劳工把院里的野草吃光，在上下班途中拣

烂菜及瓜果皮充饥。由于吃腐烂食物，劳工中毒，染病致死者经常见。劳工衣着，每人发短裤、小褂各一件，草鞋一双，冬无棉衣，披破棉毯御寒，饱受冻裂苦衷。更为残酷的是井下日本带班采煤人员任意用棍棒敲打劳工，打伤、打残或打死，从无人过问，说日本草菅中国人命，毫不过甚。劳工彼此相识，都认为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病魔缠身的活骷髅。劳工因乏食无力，下井采煤，经常因饥饿、劳累而晕倒或死亡。众所周知，日本煤矿因地质松散经常塌方砸伤、砸死矿工。日本带班采煤人员遇有事故，便强令中国劳工到塌方或危险区域抢救工人或冒险采煤，使中国劳工常与死神为伍，随时都有丧身井下的危险。回忆往昔，我们中国劳工能在日本采煤的死亡阵线上挣扎活命回归祖国，真是三生有幸！

“中华寮”内关押的中国劳工有三个头目：一是我们同路的保定人，姓张，会讲日语，当总头目，劳工呼“张司令”。赘婿日本，落户安家；二是原行唐县伪警备队中队长，姓黄，能体恤劳工疾苦，为劳工拥戴，任正队长，劳工称“黄队长”；三是深水县人，姓王，任副队长，苛刻劳工，献媚鬼子，为劳工所深恶痛恨，日寇投降，劳工开祝捷大会，清算王的罪行，打折王一条腿。另外，同县劳工有：东于庄陈良，当年十六岁，现在保定第二化工厂；北梨元村王田，现居北京，退休工人；还有高发，现居宁夏省石咀山市，退休工人；仁里村梁志刚和高四成，高现在内蒙临河；东大公村马狗尔；

南梨元村邢斗尔（邢洛本）；城内村秦三喜，外号臭鸡屎；南关刘瞎子；涑水县柴云龙，定兴县牛洛振等人。

“中华寮”近西小山坡上竖有“中华墓地”水泥碑，是中国劳工墓地标志。每当我们同伴离开人世后就抬到山坡，用干柴火化尸体，将骨灰埋葬墓地。在我们当劳工给日本采煤半年时间内，因饥饿、疾病、棍棒的折磨和塌方事故而丧生葬入“中华墓地”的中国劳工将近百名。日寇投降后，我们回国前，幸存的四百多中国劳工曾两次到墓地祭奠慰问，敬默致哀。最后离开日本国时，又到墓地向华夏亡灵挥泪告别。

四、重回祖国人民怀抱

一九四五年七月，天空几十架飞机不断轰炸矿井及附近市区，“中华寮”的日本人面带忧容，强令中国劳工防空，停产整修，说话有气无力，色厉内荏。不久，中国劳工外出干活，巧遇被得在押采煤美军，互用手语示意国际战场日军失利的消息。从此，中、美劳工分别行动，既不下井又不再做另活。日本“中华寮”的管理人员对劳工的吃、穿、住也“照顾”起来，矿商也发给了每位劳工二百多日元，这是中国劳工采煤以来统发的、唯一的工资。

日寇投降，中国劳工扬眉吐气，欢庆胜利，举行祝捷大会，追悼死难同胞，清算战犯汉奸，恢复民主、自由、独立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们四百多中国劳工乘美国第七舰队战舰

我当劳工的经历

返回祖国。国民党当局在塘沽港设“中国劳工接待站”，安排食宿，更换服装，办理还乡手续。深感祖国人民的热情、温暖。我们南梨元劳工除葬身海外一人，返回六人。回到徐水家乡，已是年底。乡亲们都为我们返回家乡获得重生与自由并同亲人团聚欢欣鼓舞，热情洋溢，喜泪盈眶，也为葬身异国而死难的同胞沉痛哀悼。大家互谈苦难经历；生路坎坷，命途多舛，中国劳工的离合悲欢，尤如皓月重圆；我们要探本求源，牢记历史教训，把控诉日寇侵华罪行的史料，世代相传。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任抗联全主任时，西安区区长王树德和我们护送一烈士灵柩过路，指派我、村长张洛庭、村武委会中队长张树桐及李洛玉一同到荆塘铺据点找地下接线人高树联系，研究过路计划。当时，我们四人的公开身份是：我是西留管伪保二甲甲长，张是伪保长，李洛玉二人是农民。九月十五日傍晚，按予定计划护送灵柩车通过荆塘铺道口时，因高树叛变，日伪将我们四人逮捕，押送碉堡。

九月十五日夜问，驻荆塘铺据点伪警备队长郑福兴指使伪军对我们四人拷打审问，我们忍受疼痛，咬紧牙关，以公开身份，应付伪军。

次日，驻荆塘铺据点伪军押送我们四人到徐水县城交给伪军

局关押。在伪 我被抓当劳工的经历 又许同归劝。

们都以公开身份 西留营 王文乐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侵略军强行征用中国人民的劳力、财物，在华北沿京汉铁路两侧开挖护路沟两条，修筑间距约五里的碉堡排由日伪军驻防，以维护铁路交通，防备我抗日军民破交，互通情报。我村西留营位于徐水城西南十八里的铁路西侧。一九三九年，日伪在铁路东侧距我村二里的荆塘铺村西修筑自北而南排列的第一百三十号碉堡，以后又建立日伪乡政府。在这里设置徐水火车站南第一处通过铁路封锁线的道口。

一九四三年八月，我任村抗联会主任时，四区区长王树林要我们护送一烈士灵柩过路，指派我、村长张洛堃、村武委会中队长屈树桐及章洛玉一同到荆塘铺据点找地下接线人葛封联系，研究过路计划。当时，我们四人的公开身份为：我是西留营伪保二甲甲长，张是伪保长、屈章二人是农民。九月十五日傍晚，按预定计划护送灵柩车通过荆塘铺道口时，因葛封叛变，日伪将我们四人逮捕，押进碉堡。

九月十五日夜，驻荆塘铺据点伪警备队长郑福兴指使伪军对我们四人拷打审问，我们忍受疼痛，咬紧牙关，以公开身份，应付伪军。

次日，驻荆塘铺据点伪军押送我们四人到徐水县城交给伪警察

局关押。在伪局里，伪警软硬兼施，既行刑拷打，又诈问归劝，我们都以公开身份做“回敬”。

半月之后，伪警察局又将我们四人转押给宪兵队审问，我们在经受敌人用杠子压、凉水灌、通条汤等极刑苦处后，只承认公开身份，始终没说只字真情，没暴露共产党员和村干部身份。

一个半月以后，记得在十一月十七日夜，宪兵队派武装伪警押送我们四人上火车转送到石家庄南北营“劳工训练所”监禁。

“劳工训练所”周围开挖五米宽、六米深的封锁沟，架设三层铁丝网，密布许多碉堡，只设一处座南朝北的通道，有一百多伪军岗哨日夜监视劳工活动。这个“劳工训练所”里监禁着近三千名劳工，绝大部分是被抓的农民，县、区、村三级抗日干部，被俘的八路军官兵，只有极少数被敌伪嫌疑的伪、警、宪人员。敌伪将劳工划为预备、普通两班和二部三类，分别关押。劳工在白天只能四人一列并排呆坐，夜间必须四人一排一向侧卧睡，解手出恭都得报告，否则，按违犯“戒律”遭到审讯毒打。劳工所食，每餐发给不足四两且发霉的高粮米饭一碗和少许咸菜，穿的衣服难以洗换，铺盖被褥得不到拆翻，虱子成堆，吸吮人血。加以宿舍阴暗无光，空气污浊，劳工面黄饥瘦，病魔缠身。一旦患有疾病，不予治疗，只有死亡。南留村的高温和姓范父子俩，潜河的孙忠、中所营的马树春，北高桥的李春等乡亲，由于承受不了敌人的折磨摧残，都先

后死于这所阎王殿。当时劳工私下议论：每天被敌人摧残致死的近百余人。开始，劳工尸体穿衣外运埋葬，后来，竟裸体运出，敌伪岗哨还用刺刀刺尸体头颈，惟恐劳工生者装死混出去。劳工目睹敌伪荼炭中国生灵如此灭绝人性，产生集体越狱思潮，以求死里逃生。

一九四四年阳历年夜晚，由预备班劳工切断电源，打死看守，掀起集体越狱活动。因组织不严密，被敌伪发觉，最先集体冲到门岗附近的二百多劳工，尽遭枪杀。有一不满十六岁的安新县少年，竟残死于敌伪棍棒之下。次日清晨，敌伪又打死百余劳工，并砍下头颈，悬挂桩上镇压示众。次日中午，敌伪还在“劳工训练所”操场四周活埋了不少劳工。我们四人在参加集体越狱活动时，发现敌伪镇压，没敢回房间，敌伪认为我们没活动，才幸免杀害。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敌伪将我们四人同一些劳工，武装押送到塘沽“劳工训练所”。在那里，我们经常遭受敌伪人员辱骂：

“打死你，从窗户扔出去喂狗！”半个月后，记得在二月二十七日，敌伪命我们检查身体，并进行欺骗，说什么“大日本国男子奇缺，妇女众多，你们身强体健，送往日本国安家”。当天下午，敌伪对我们一千八百多劳工进行武装“护送”，强令整队装入轮船，开往日本国。在航海途中，不知多少劳工因得疾患病，借口传染，被敌人抛海溺死。清苑县后营的李文铎（后营支部书记）^被残害于途中葬身鱼腹。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三日，劳工抵达日本国下关市后，仍是武装“护送”改乘火车，经本州过青森——函馆轮渡到北海道，在芦别煤窖当劳工。我们是第一批到芦别煤窖的中国劳工，日本管理人员将中国劳工划分两个大队和若干班、组，每日分三班下窖采煤。数日后，又将到该窖的第二批中国劳工八百多人，补充到各班、组。当时，一齐下窖采煤的乡亲有：米家营李歧、韩殿耗、中所营杨风山、徐水北关安国志、张文波，南留村李文元，十里铺孙瑞恒，正村两名干部，共十多人。还有徐水县伪警备队大队长宋春芳也编到班、组下窖采煤。

日本北海道芦别煤窖四周，群山起伏，交通不便，且经常大雪，气候寒冷。中国劳工只能领到一双草鞋，每次上下班要穿越五道山岭，三条河流，路窄坡陡，行路艰难，手脚被冻、打炮经常发生。在饮食上，中国劳工的早、晚两餐，每顿只能吃两个杂合面窝头和少量咸菜，中午饭只发给三个窝头带到窖下。因日本人强迫中国劳工实行包件制，劳动强度过大，不少劳工在早饭时就吃光中午三个窝头，下午只好忍饥挨饿。因包件制延长工时不准下班，在窖下经常发现累饿死的劳工。煤窖警备班的一个日本人——外号“小胡子”，在不到一年时间，借口包件制，竟用铁锤打死中国劳工六十余人。顺德府一劳工因惊吓精神失常在拣食地上米饭时，被“小胡子”一脚踢死。

芦别煤窖的地层十分松散，经常塌方，日本管理人员又不在井下置安全设备，视中国劳工如草芥，听任工伤、塌方事故发生。一九四四年四月发生塌方，砸死中国劳工三十余人。后来，日寇投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国劳工召开追悼大会时，才知道因工伤、塌方事故夺去近五百名中国劳工的生命。最令人痛心愤恨的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名劳工于下班途中被野兽吃掉，日本管理人员竟不过问。

一九四五年七月中旬，中国劳工发现日本人自北海道南逃，行动恐慌。煤窖工地的日本人，三一伙，两一群，交头接耳，鬼鬼祟祟，面目表情反常，显得忧虑。中国劳工大队长马成英得到这种情报后，便派人偷取了日本报纸，得知日本天皇裕仁已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国劳工两个大队共一千余人，在马成英带领下，手持铁镐、斧头、棍棒，包围了芦别煤窖的日本警备队，收缴了武器，当场打死残余中国劳工不脱眼的刽子手——日本“小胡子”。同时，命令芦别窖矿的日本管理人员为死难的中国劳工祭奠，并进香朝拜，还召开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马成英以中国劳工队长身份代表中国劳工愤怒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领土，残杀中国劳工的滔天罪行。会后，中国劳工热情拥抱，敲锣打鼓，祝贺胜利，渴望归国还乡。

马成英，当年三十多岁，能写会算，口才流利，有胆量，有智